

论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

樊 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樊 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乐秀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樊 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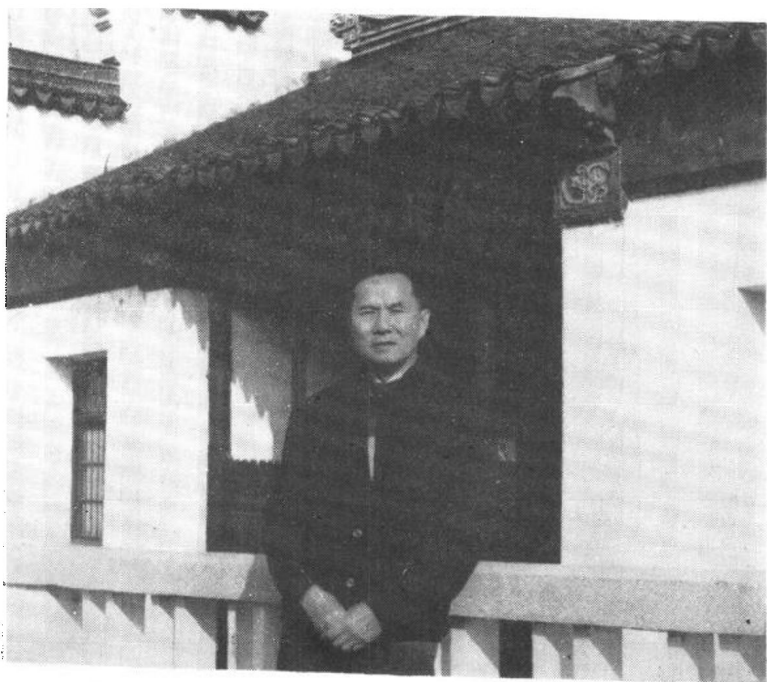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3 字数 249,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 7-5321-0913-5/1.659 定价：6.15元



学术研究的每一个开拓、突破都是从
已有的成果、结论起步的，有所超越
也有所承袭，由此汇成学术发展的长河。

樊 骏 91.12.23.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	2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48
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	62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79
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	105
重评小说《四世同堂》引起的思索	133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14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和前景的几种看法的 述评	181
关于讨论近一百多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	196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	2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	316

前 言

本书所收的，都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所写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建设和发展、成就和问题、经验和教训的文章。编选修订过程中，回想起当年写作的经过和其他有关情况，觉得有些事情需要先向读者作个说明；于是，有了这样一篇前言。

—

我为人拘谨，做事多烦琐习气，常常犹豫不决，想问题写文章也总是没完没了地反复和拖拉——就性格而言，本来是不适宜写这种对整个学科作鸟瞰式考察评说的文字的，写的时候，也的确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记得何其芳同志说过：作家创造了文学历史，研究者只是记录、剖析、总结这段历史；他原是借此说明自己更希望能够继续创作，而不愿意改行从事研究工作。而比之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和创作问题，这种学科评议可以说是研究的研究，与文学本身又隔了一层，因此较一般的文学研究，对作者和读者说来，更少了一些吸引力；对学科的建设，也不是那么直接。再说，对别人的工作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从来有些令人讨厌，对于过去那种“大批判”的反思，更使人们普遍地厌恶以仲裁

者姿态出现的判断是非得失的文字。而学科评议的文章又似乎很难完全摆脱这样的色彩。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把这作为研究课题和专业方向,都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但不管怎样,十多年来这又的确成了我的一项主要任务和经常性工作——在一些场合,我往往被指定或者被要求对这门学科的情况和动向作些介绍分析。本书就是这些活动的成果,也是这个事实的明证。

世上任何事情的发生形成,哪怕是一些看上去奇怪异常以至于不可思议的事例,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直到这次整理文稿,也终于理清了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和多方面的原因。

1979年2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文学学科研究规划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的同行聚集一堂的第一次盛会。在筹备过程中,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惊醒了人们,然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号召,使人们精神振奋、思想活跃。会前,具体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许觉民同志提出,会上不能只限于制定具体研究规划之类的事务性工作,还应该对文学研究工作作些学术性探讨;为此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几位同志,对文学研究的各门学科分头准备专题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任务就分配给我。到昆明后,好几位同志纷纷推辞不干。许觉民同志以文学研究所作为主持单位,在大会上没有人作专题发言,有点说不过去为理由,责成我务必完成任务。我体会到他的难处,也被唤起了一种责任感,在最后一天的会上作了发言。这本来是一项临时差使,带有偶然性,也是可以推辞掉的,却成了把我与这项工作联结在一起的开端。

不过,在这类任务面前,我仍然踌躇犹豫了好几年。那次会上,许觉民同志嘱我把发言整理成文章,交给即将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后者也多次派人催促过。尽管同一年我在其他

场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还竟然把原先不到半小时的发言逐步扩充到五六个小时的长篇大论，却从来没有将它整理成文章发表的念头。王瑶先生在昆明听了我的发言后，嘱我于1980年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次年会上作个类似的发言，我也坚决谢绝了——此事使我很是烦恼，连血压都一度骤然升高了。这些事例，说明当时自己对此既无兴趣和内在的动力，更缺少必要的信心，根本没有把这工作作为自己一项正式的专门的研究任务。

1980年底或1981年初，文学研究所决定编纂《中国文学研究年鉴》。自1980年度编起，每年一本；由各研究室负责撰写本学科的年度述评。现代文学研究部分的任务，就由我（署名辛宇）与一两两位年轻同志承担起来。从此，我必须经常注意和把握这门学科的态势和动向，并随时作出估计和评价。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号召，使我在1979年初得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学术勇气，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作出批判性的回顾；那么随着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各个领域的深入贯彻，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在作一年一度的研究述评时，展现在眼前的更多的是这门学科多彩的变化和迅速的进展了。在每年数百篇、上千篇的文章中，除了读到不少闪耀着思想光采的见解，还可以感受到研究者为摆脱旧的、探求新的所作的种种内在的努力。其中，有对于过去的反思，也有对于未来的突进；有文学观念方面的立异，也有研究方法上的求新；有限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也有牵涉这段文学历史全局的；有仅属个别人的创见，也有已经成为众人的共识的；它们有的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有理有据，有的可能只是灵机一动，虽然颇有锋芒，却又显得草率；有的大胆果断，咄咄逼人，有的胆怯徘徊，进两步又退一步，有的自身也还相当朦胧，

不易捉摸；有的无疑是学术上的真正突破，有的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有的则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新的歧途——这些，或者如雏鸡之破壳，或者像春笋之出土，虽然并不都是有说服力的，经得起反复推敲的，学术上有可取之处的，却又共同地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和突飞猛进的声势，为这门学科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把所有这些变化放在一起考察，再与过去几十年的艰辛道路联系起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门学科正在进入一个万物复苏、孕育着新的生命的春天。我在振奋中被紧紧地吸引住了。在年度的研究述评工作中，还日益深切地意识到如果能够随时把各家的新的探索和学科的动向，逐一地作出科学的梳理和概括，肯定成绩，揭示实质，指出问题，提出任务，变个别人的尝试为大家共同的努力，由模糊走向明确，把自发的提高到自觉的，一起来及时总结是非得失和经验教训，共享成果，同攀高峰，岂不是很有意义的吗？回顾过去陷入“左”的谬误而迟迟不能自拔，反而越陷越深的经历，更加体会到这个工作能够发挥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和按照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来推动学科的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实在是不可或缺的学术任务。由此激发起来的责任感，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促使我随时留意和反复思考这门学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我自己也终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角色。

1982年5月于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上，我就整个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个专题发言，会后又将发言修改成文章交《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和前一次形成鲜明对比的，这次是我自告奋勇这样做的，因此可以把这看作发生上述变化的标志。这种主动性，自然带有偿还前几年所欠下的王瑶先生和那份刊物的债务，当时他们的好意成了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经过三年左右的积累和考虑，的确开始感到自己在这个方面还是有话要说，有内容可写，也有责任分担一些

任务的。在这以后，我又借参加现代文学研究会各种活动的机会，有意识地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不同方式了解研究者的想法、要求、志趣、苦恼，正在进行的课题、今后的打算、存在的困难等，即除了读他们正式发表的文章，还进入他们的内心、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尚未完成的项目，以便在动态中，多方面地掌握整个学科的情况，尽可能深入一些内在层次，并且预测随后的演变。在这些基础上，就学科的建设发展陆续地写了一些文章，其中的大部分成果收在本书中了。

所以，如果说本书各篇文章记录、剖析、评价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十多年来的变化发展，首先还是这些变化发展本身给我以兴趣、力量和信心，使我终于担负起这一任务。

二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专题论集，所收的文章是断断续续地写下的，各有独立的题目和侧重阐述的方面。但它们都围绕着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总的课题，对有关问题分别作了分析和评价，力求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求开创这门学科新局面的途径。各篇文章所探讨和论证的，有内在的连贯性和联结性；除个别篇什外，都是在统一构思下写成的；各篇贯串着共同的基本命题，并且由此形成了几条主要的思想线索。所以，也可以把这作为一本结构松散的专著看待。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多变化，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和明显的进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作出不同的概括和判断。从学科的整体建设发展历程来看，我觉得意义最为重大的变化、成就和进展，是它终于从单一的文学批评的阶段进入综合的历史研究的阶段；也就是说，自有现代文学研究

以来,过去主要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如今正在获得和建立日益鲜明丰满的史学形态。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总体而言,研究对象不再是继续进行中的现实的文学活动,而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发展、成为自成段落的文学历史;2.研究者不是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和“平视”的眼光,就事论事式地探讨具体的局部问题,而是以后代人的身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以“俯视”的方式,重新审视和评估这段历史,即使所讨论的也只是局部问题,同样是从历史的全局出发;3.因此,也不再以单纯的现实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而是联系文学的前后演变,来确定他们各自在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位置;4.如果说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于具体作品和文学事件的优劣得失的分析评价,给所讨论的对象以直接的建议和推动;那么文学史的根本任务,在于梳理、剖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给现实的文学工作以历史的启示;5.所以,比之文学批评,文学史配合现实的任务和由此带来的政治色彩都有所减退,而学术品格则有明显的增强。本来,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文学由现代阶段跨入当代阶段,现代文学开始成为历史的存在,现代文学研究也就日渐具备这种转化的主观条件。然而接连不断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总是把现代作家作品、文学事件和有关的研究卷入现实斗争的漩涡。试想在认定胡风乃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头子”,在宣布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贯串下来统治整个文艺工作的年代里,除了把他们彻头彻尾地批倒批臭,还能做什么呢?能够把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活动及其功过得失,与这些现实的判决分开,进行什么历史的评价吗?学科的研究形态自然也就谈不上实现这样的转换了,并且整整延缓了二三十年。进入新时期

以后,情况逐渐变化,才终于开始了这样的演进。研究形态的这一根本变化,影响所及的自然不限于个别的研究者和研究课题,或者其他局部和枝节的方面,而是改变了大多数研究者立论的高度、考察的视角和视野、所持的标准和尺度、所选的题目和论证的方式等,从而使整个工作的面貌为之一变。换句话说,可以以此包括(至少是可以用来统率)这门学科近十多年来的所有具体的变化、成就和进展,而这种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密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又因为这是经过长期的耽搁才得以实现,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整个工作正在因此形成新的态势、格局和特点,需要研究者能够自觉地适应这种转换,对于由此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要求和任务作出积极的响应,我意识到有责任尽快对此作些探索和分析;但唯其是牵涉面广又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一切又刚刚冒头,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概括和透彻的陈述。在198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年会上,我提出这种估计后,虽然得到一些同志的赞同,但也引起另外一些同行的疑问:是否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能否这样区分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形态?有位香港学者还向我提出这样的质疑:你是不是太看重文学史了?文学史有一部就够了,却需要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这些疑问使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把意思交待清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形态,本来是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无法也不应该截然分开或者对立起来;把学科发展概括为从文学批评的阶段向文学史的阶段转换,也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的,是就总体而言的。至于认为文学史只要一部就够了,那是把文学史看作工具书或者文学史料长编之类的参考用书,其任务就是提供准确丰富的文学史料,为人们随时查找核对史实之用;和我把文学史看作是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系统

深入的分析评价，因而对于同一段历史需要不同的文学史家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另写、重写，提出自己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和判断的看法，在学术观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有待于充分的事例作为论据；要立即作出有力的说明，对我说来还存在一些困难。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在将这个发言整理成文章发表时，基本上把这个内容删去了。1984年9月于哈尔滨召开的研究会的第三次年会上，我把这作为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提了出来，作了较多的论证。随后，又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等文中，专门从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对于学科发展的这一估计和论证，渗透在本书的大多数文章中，还决定了我对于如何进一步建设发展这门学科的思路，这构成全书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比如反复强调理论和史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思以往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感理论修养不足是我们自身的最大缺陷。这里所说的理论修养，包括各种思想学说，但主要自然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两者，在发展过程中都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我们也往往自认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过去的实践证明，恰巧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引，使我们滑向“左”倾，而且在这种迷误中不能自拔；因为缺少应有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力量，整个学科的学术水平也迟迟难以提高。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而随着这门学科进入历史研究阶段，所面对的对象和要求比之过去文学批评阶段，都要远为庞大复杂。进行系统全面的历史考察，作出科学的历史评价——即使所论述的具体课题只限于一个作家或者少量作品，也要求在这样的历史考

察和历史评价的总体前提下进行，因而包含着更多的理论上的把握、透视和概括；也就是说在理论修养、理论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学术史上的事例来看，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容易忽略理论方面的自觉追求。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有位从事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谈到：研究理论的人应该多掌握些历史知识，以便使他作出的理论概括不至于游离于客观的历史进程之外，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规定性，有关的判断也不至于违背客观实际。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提高理论修养，以便穿透重重历史迷雾，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科学的有深度和力度的判断，也才谈得上总结历史规律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可能因为他是研究思想史的，正好属于“思想”（理论）和“史”交汇兼顾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有格外深切的体会；而他说到的，又确实是理论学科和历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提高理论水平对于正在进入史学形态的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

关于史料问题的思考和论述，在时间上要靠后一些。文学批评自然也要有的放矢，言之有据，也要掌握材料；历史研究更必须以尽可能详尽准确的史料作为依据和基础，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材料、资料之外，还另有史料这个名称，可见这“料”在历史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位置——没有史料，也就无历史研究可言。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最初几年里，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一度呈现全面铺开的局面，与这门学科向史学形态转换的进程正相一致。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在最初虽然也谈到过史料的重要性，反而没有把这作为一个主要论题充分展开。但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学术界相当普遍地掀起介绍推崇新观念新方法的热潮，而积累资料、切切实实做学问的风气受到削弱；有的文章一味大处着眼却忘了同时还得小处着手，宏观成了空观。这些，在现代

文学的研究工作中也有所反映。我在来稿中还读到过蒋光慈是看了巴金的《家》之后才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的，老舍的《茶馆》包含着对于反右斗争的批判之类的说法。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以至于此，实在使我吃惊不已。尽管这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然而它们的出现终究是个需要引起警觉的信号。这直接关系这门学科的科学品位和史学品格。于是我转而着重探讨史料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对于史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史料工作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从认识到实践都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而随着现代文学研究向史学形态演进，扭转这类偏向，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把史料工作作为整个学科的一个分支，称之为“宏大的系统工程”，目的就在于呼吁大家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同心协力把它做好。唯有如此，整个学科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如何看待理论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古今中外的学者几乎总是在这方面反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倾斜。在中国，有时大谈义理，有时潜心考据，还往往由此形成整个学术界不同的时尚和学风。在西方史学界，也有重在叙事、描述的客观主义的“事件的历史”模式和旨在分析、解释的主观主义的“概念的历史”模式相互对峙、交替的不同学派。两相比较，很难说孰高孰低，孰是孰非。只能说这样各执一端，固然也会各有长处、成就和开拓，又都各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严重时，绝对化了，都会使工作丧失科学的品格。马克思主义要求两者的统一，“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毫无疑问，当我们的学科进入历史研究的阶段，对于现代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进行历史的审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视和评价时,需要坚持和贯彻的正是这样的原则和学风。

又比如要求当代性和历史感的相互结合。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后人仍然孜孜不倦地作着研究,又总是能够不时地得出不同于前人的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而决不是仅仅重复先辈的结论。其中缘由除了有赖于新近发掘出来的史料以修正、充实、深化对于历史的认识之外,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任何活动无不受所生活的时代的具体条件(从当时的物质基础、社会实践到思想认识水平)的制约,从而与其他时代的人处于不同的历史高度。于是随着时代的变动,后人能够以不同于前人的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评价同一段历史,得出新的结论,即另写或者重写历史。这是时代精神即当代性在历史研究中所起的神奇作用,是它决定了尽管所研究的对象已经凝固死亡,甚至成了极其遥远古老的过去,仍然可以成为值得后人探讨的课题,其成果也依旧具有现实的品格。而且和人类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正是由不同时代的这些各具相对真理性的认识,汇聚而成有关历史的绝对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同时代人的评论(比如文学批评)之外,还要有后人的反复研究(比如文学史),为什么历史研究——无论在这样那样具体的问题上,还是就整个学科而言——能够不断发展并且永葆青春的奥秘所在。在大的时代变动中,当时代精神发生急速变化或者特别高扬或者显示出特别强烈的特色时,这种作用也就格外显著。所以历史研究者不能完全沉浸在往昔的岁月中,使自己也成了古董,而是同样需要与自己的时代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当前这样的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更得如此。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段历史,我们也把它作为一段历史进行研究,研究者主体确立对于当代性即时代精神的自觉追求,对于学科的建设发展无疑具有迫切的意义。当代性看上去似乎是个属于“新潮”的命题,更为“接受